

# 塞拉勒窩內史

---

〔英〕克里斯托弗·法伊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塞拉勒窝内史

## 中 册

〔英〕克里斯托弗·法伊夫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第九章

理查德·多尔蒂上校接替坎贝尔，并被恢复 207 了从 1827 年以来就虚悬着的大将军和大总督的老尊称，虽然薪俸还是照旧。到此为止的设置副总督制的十年，并不是一个能鼓舞对威权的信任的时期。在过去十一个管理政府的官员中，两个是非法篡夺的，两个是不光彩地被召回国的，一个精神失常，三个在就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死去，还有三个是临时的代理总督。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期，一个年轻的英格兰人马格纳斯·史密斯到弗里敦来经商，被吸引到法律方面，他热切地掌握了这方面的本领，后来在法庭中执业，由于其顽固的粗暴行为，两次被从律师名单上除名。他向枢密院申请复职（因殖民部对法院无管辖权），并为了唤起同情，以被压迫者的支持人自居，把证人带到英国，证明坎贝尔

曾根据 1836 年条约把逃走的奴隶交还给他们的  
主人。威廉·艾伦处理这件事，议会中也提出了  
质询，于是多尔蒂奉命废除第二个马比累条约连  
同其有关交回逃亡奴隶的条款。

这样，据查是花费了八百英镑以上的坎贝尔  
的大规模远征，就落得毫无结果。酋长们不愿同  
一个不肯把逃亡奴隶交还给他们的政府再签订什  
么新的条约。达拉·莫杜由于失去了同盟者，也就  
无能为力。由于在庞加斯河地区或加利纳斯有着  
随时可把俘虏卖出的市场，所以没有人对保持和  
平有任何兴趣。有个约尼族的军事酋长从马比累  
高高兴兴地回家去，用盒子装着那份奇妙的条约  
的副本。一年年底，他把百姓召集拢来，庄严地打  
开盒子，看看那位伟大的阿巴斯用法术在那里藏  
着个什么宝贝。当他发现只有一张发霉的纸片时，  
他是如此恼怒，就立即回复了他的军事生涯。

请求政府干预以恢复和平的从殖民地来的商  
208 人，自己却不做任何事情来保持和平。当木材越  
来越少时，他们也变得更加乱来了。一个酋长卖  
给某一商人的木材，会被另一商人截去，把标志弄  
掉。由于不受英国法律的约束，所以他们不用怕

处罚。

1839年，一个马隆人木材商在罗克尔河地区他自己的木行里被他的伊博族获释奴隶雇员开枪打死。福雷杜古的酋长把凶手交给一群马隆人，他们就把他活活烧死了。政府提出抗议，但是无能为力，因为两起犯罪都是发生在它的司法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在殖民地的伊博人威胁说要对弗里敦的马隆人施加报复。只好派出兵士，又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以驱散他们。有几个马隆人就到布洛姆海岸去躲避了。

酋长们是不得处罚英国商人的，而政府又不能处罚他们，所以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每当多尔蒂审查一件控告酋长的诉状时，他总发现应该责怪的却是个商人。他发现，在塞拉勒窝内，也正如一个调查对待土著情况的议会委员会在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所发现的那样，英国法律只是用来保护那些做坏事的英国人的，而不是保护那些受害者的。

约翰·兰利从泰姆奈人的监禁中被释放出来以后，就留在马比累经商，跟达拉·莫杜交上了朋

友，为即将离任的坎贝尔征集有利的请愿书，而坎贝尔也报之以夏洛特村助理总管的职位。多尔蒂正准备试一下派一个获释奴隶做总管，所以也就同意了 this 任命。但是在英国行教会书院所受的教育还未能使他胜任一个总管要做的填写各种报表的工作；他对法律也所知太少，未能执行治安推事或验尸官的任务。他的早年的经历使他憎恨权威，受到训斥就表现傲慢，且又漠视命令。1839年，多尔蒂把他撤职了。

多尔蒂骑了马在各个村庄里巡视，看到那些塌毁的公共建筑物以及无人居住的茅屋，他认识到，那些总管们名义上是在严格管理下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纸面上负责。帐目、收据、付款凭单、报表等等，吸引了在弗里敦的官员们的全部注意力，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视察这些村庄，只要能收到足够的完整的报表就满足了。即使在弗里敦也没有适当的制度。坦普尔的规定早已莫明其妙地消失了。仓库里仍然堆满着许多无用的东西，慢慢地被白蚁蛀掉。

甚至究竟是应由谁对基西村的一所获得自由非洲人部医院负责，也弄不清楚。这所医院有一个

周密的入院存根的制度，却无法看出究竟院里有 209 过多少病人来治疗，或者他们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又不见了。帐目表明一个季度里消耗了六百加仑酒。约翰·奥古是女王大院的监工，负责供应食品，在市场上买大米或山芋，或买进缉获船拍卖物资，并在需要时把它们送出去，既没有所需数量的正式申请单，也毋需审核它是否已经用掉。当多尔蒂宣布说以后将凭合同供应医院的食物时，奥古就辞去了他的监工职务（及其五十英镑薪金），而去做专门的合同承包商了。他在 1842 年死时，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

根据多尔蒂的要求，获得自由非洲人部的仓库和帐目都移交给军需处管理，它是一个人员配备健全的机构，也是对英国财政部负责的。获得自由非洲人部的副总监及其精简后的属员，则留下来亲自去管理获释奴隶的事情，而不是从纸面上去管理。

没有委派别的获释奴隶去代替兰利，但有几个马隆人被委派为助理总管。约翰·帕尔默曾在弗里敦担任过公立学校的教师，被派负责肯特村；乔治·卡明斯负责惠灵顿村；约翰·利伯特负责

黑斯廷斯村。阿什利军士和希林军士曾长期在默里村和阿伯丁村任监工，被酬以更高的薪金；阿什利被委派负责威尔伯福斯村。

为新来的获释奴隶建立了更多的村庄。在西海岸建立了苏塞克斯村；在南海岸建立了汤博村（这是个布洛姆族老村庄，一度属于考尔克家族）；在滑铁卢村附近建立了本桂马村，这名字据说是从门迪族来的（虽然那里住的主要是阿库人和卡堪达人）。但是有许多人从自己的村庄里搬出来，甚至完全搬出殖民地，不再受总管们的控制，而搬到库亚地区更肥沃的土地上去。到1838年时，据认为大约有三千人住在那里。

“科索”获释奴隶先前大都是被从门迪人地区带到歇尔布罗或加利纳斯出卖的。现在同别的获释奴隶一起被安置在殖民地的村庄里，他们自然不安心居留。有些人同相隔不过几天旅程的同乡建立了联系；有许多人搬到库亚去了。泰姆奈人发觉自己被东边的门迪人和西边的门迪族获释奴隶团团围住了。

搬出殖民地去住的退伍军人受到威胁说，如不迁回，将要失去他们的年金了。获释奴隶却没



法弄回来；正象殖民地的商人一样，他们是法律管不到的。1838年，库亚的酋长们向多尔蒂抱怨他们的侵入。多尔蒂回答说，他对居住在殖民地外面的英国臣民是不负责的，并发出了一个警告说，他们住在那边要自己负责。

两年以后，罗克尔河地区的主要酋长莫莫<sup>210</sup>杜·邦杜同东南面的门迪人打起仗来。那些门迪人夸口说，他们的获释奴隶同乡会从背后袭击他。库亚是充满了好战的人的，马班塔泰姆奈人、布洛姆人、邦杜卡人，都帮助泰姆奈人打洛科人。他们抓住一次殖民地人同泰姆奈人之间有关一些木材的争执作为借口，把那些闯入者赶了出去。他们把多尔蒂的关于英国臣民住在殖民地外面要自己负责的警告解释为他们要把这些英国人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就开始把他们往西赶，并把他们捉起来卖掉。据说，有一千五百人被杀掉或沦为奴隶。

多尔蒂派军队到滑铁卢村去保护边境，但是泰姆奈人并不试图越过边境，声称他们对殖民地是友好的，他们不过是谋求保护自己不受非法侵犯而已。多尔蒂接受了他们的保证，并建议他们把库亚的部分土地割让给殖民地。但是，过去已

经割让过那么多，他们现在不愿再割让了。

英国政府决定不为塞拉勒窝内特别铸造钱币。1825年，英国通货被宣布为法币，与业已通用的西班牙银元同时使用。由于财政部在英镑和银元之间规定了一个很高的兑换率，所以欧洲商人就把英国银币积聚起来送回国内以获取利润。供零找的钱越来越少了，所以人们就把银元切成两半或四小块，市面上一般也都通用的。这些“碎钱”在流通中损耗了；后来，切成五小块的银元可以被冒充为切成四小块的用出去。1832年，总督和总督委员会把它们回笼，在上面盖上一个皇冠图记和“验讫”二字，以防假冒。切割银元继续进行，未打过图记的碎钱仍在通用，但是公众对它们的信任已经丧失了。

1838年，财政部同意把它们统统回笼，并预支给总代办处九千英镑买了英国小银币，运去以供兑换。获释奴隶们的积蓄大部分就是这种碎钱，所以被允许不论磨损状况如何统予兑换，而其他的人则按重量兑换。不堪使用的碎钱就在英国作碎银卖掉。银元在1843年重新定值，继续同西班

牙金币和法国法郎同时通用。使用的英国钱币包括很小的值一便士半的小币，是专为各殖民地铸造的。但这些小钱币太容易失落，所以不大受欢迎，后来就不再运去了。

一艘运木材的船在 1836 年 12 月间开到弗里 211 敦，船上有黄热病。病人被送到病室，一场传染病流行起来了，猖獗了八、九个月之久。三分之一的欧洲籍居民死了，而且，这次不同往常，有些移民也死了。医生们给病人的处方仍然是强迫催涎。水蛭也从布洛姆海岸弄来，给病人吸血；木馏油也用上了，内服和外敷都用。

次年 11 月，一艘海军船只又带来了黄热病，于是又一次发生了大量死亡，直到 1838 年 5 月。在 1839 年 7 月黄热病又发生。有十个欧洲籍居民死亡，其中包括首席法官兰金。从没收的贩奴船上来的、无所事事等待有船来把他们送出去的许多水手，也染病死了。除了黄热病之外，又加上了 1838 年的一阵剧烈的飓风毁坏了弗里敦；圣乔治教堂在 1839 年遭到雷击；1840 年，城市的东部地区被火烧光了。

这样众多的公职人员死亡是很难补充起来的，这使殖民部又重新提起了乔治·默里爵士早先答应过的任用非洲人后裔做官员的诺言（参阅第 178 页）。斯蒂芬建议任用非洲裔西印度群岛人。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候选人约翰·卡尔，他是特立尼达人，曾在伦敦的大学学院读过书。他在英国获得了律师资格，于 1840 年来弗里敦担任皇家检察长。

萨维奇长时期以来很想获得司法界官职，在 1837 年未能如愿以偿就死了，还欠了他的合伙人加比登的债。加比登自己也欠了一家伦敦放债公司八千英镑的债，他到伦敦去，想劝政府买下马塔孔岛，在那里他曾造了房子。他发觉殖民部对此很少兴趣，尽管他暗示说，政府如果不买，他可能会把它卖给美国人。1839 年他死了，他的事业弄得一团糟。他在水街、乔治街和特里劳尼街的值钱的地产都卖掉了。除了商业上的债务以外，还加上一些孤儿们提出的所有权要求，他们的父亲的产业过去是由他经管的。麦克福有一段时间是他的合伙人，也破产了。还有赫伯特·威廉斯也是如此，三年后也因欠了伦敦一家公司的债而破产

变卖了。詹姆斯·威廉买下了他的最好的地产，获释奴隶取代了马隆人。

还活着的马隆人，或是他们的子女，其成就很少能超过在河流一带开小木材行的。在殖民地受过教育的查尔斯·布朗，是一个最大的欧洲商人的雇员（在他的老板不在时做代理人），在1840年被挑选任警务长官。第二代最发迹的一个是约瑟夫·格林·斯皮尔斯伯里，他母亲是马隆人，父亲曾任殖民地医务官。在移民中，差不多就是他一个人在没收船物资拍卖中能出高价，并把他的赢余投资在房产上。1839年，他以五百零五英镑买下了罗顿街和基西街转角上的地产。不久以后，他212跟托马斯·卡鲁和贝特西·卡鲁的女儿汉纳结婚，她带来了罗顿街的一处地产作陪嫁，这是她父亲花了近三百英镑买下的。

这种婚姻使移民们十分恼怒，他们认为，同那些获释奴隶暴发户的子女联姻，这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的地位被出卖了。他们原来一向轻视那些“新来者”，而当他们发觉不得不对那些记忆中是赤身露体的奴隶以社会平等成员相待，而且在生意上自己还要输给他们的时候，这种轻视

就变成嫉妒的愤怒了。

马隆人既被一个他们所不能尊重的政府所忽视，又被他们所痛恨和鄙视的对手所取代，因此，有二百人以上再次提出请愿，要求让他们回到自己的老家牙买加去。他们没有能获准得到免费船票，于是有一位马隆人老寡妇玛丽·布朗太太自己买了一艘多桅船，在1840年元旦，她同她女儿、女婿（一个西班牙奴隶贩子）以及几个别的马隆人一起上船驶回他们那时刻怀念的光荣的家乡去了。

有两个豪萨族人，他们是在特立尼达获得解放的，于1837年在前往贝宁湾的奴隶贸易中心巴达格里去的路上，经过弗里敦。他们是准备从巴达格里再回到自己家乡去的。他们的长途漂泊在获释奴隶中引起了动荡。有许多获释奴隶，尽管在生意上很顺利，总是觉得在这片土地上自己总还是外乡人，虽然他们已接受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参阅第186页）。他们感到，在塞拉勒窝内，他们的努力是被忽视的，他们的劳动是不需要的，他们的成就是被怨恨的，他们幻想着在自己的老家能

找到新的机会。于是三个获释奴隶合买了一条船，改名为“维多利亚女王”号，装上了货物和六十七名乘客，在1839年4月1日驶往巴达格里去了。

在他们回来以后，一些有地位的获释奴隶，以阿库王托马斯·威尔为首，还包括至少一个纽佩族人和一个豪萨族人，向政府请求让他们在巴达格里开辟一个殖民地，由英国管辖。他们建议，在那里不单是经商，而且还把他们新信奉的宗教带给自己的同乡人，在那一千哩外的奴隶贸易中心传播一个福音，他们相信这福音将会把奴隶贸易肃清的。他们要求派一个传教士帮助他们。但这个动议是他们提出的，这计划是在非洲的非洲人想出来的，不是在伦敦的一个传教团体的会议上讨论出来的。

英国政府不愿发起那样一个似乎是危险的而且可能证明是很费钱的冒险，但是并不阻止他们以个人身份前往。获释奴隶酒商威廉·福克纳以213三百八十三英镑买下了一艘巴西的没收船只，照他的欧洲籍妻子的名字改名为“玛格丽特”号，带了另一批人去了。结果他们是失望而归。

另一些人就更加坚定。威廉买了一艘没收船

只。威廉·约翰逊是个阿库人，开始做小渔夫，后来做商人，似乎发了横财，也买了一艘船，由他自己驾驶在沿海地区上下航行。回去的获释奴隶并没有如别人预料的那样被杀害，而是受到了欢迎。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有几百人回到了那当初自己被带上手铐脚镣运出来的海岸，并转向内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非正式地继续进行那废奴论者和传教士们所长期来渴望做到的在非洲的使命。

英国行教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重新恢复了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人员。新的传教士来到了，有德国人也有英国人——1837年有五个——以重新配备村庄中的人员，这使居民们很高兴，他们欢迎这些新的传教士和教师。约翰·威克斯曾在山区做过传教工作，从前做过木匠，就教他的学生们使用车床，他妻子则教女学生们纺织。他叫他的人们着手重建在里靳特和格洛斯特的坍塌了的教堂。在基西路为日渐扩大的东部郊区的人们造了一所教堂。石匠彼得·休斯在教会的督促下负责这一工作。

为了从一个日见富裕的人口中收回一些开



支，英国行教会和卫斯理传教会开始向在学儿童收费每周半便士。当不收费的时候，是很难劝说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的，现在一旦要付费，他们却争着要送去了。缺乏学校教育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耻辱。欧洲人发现他们的仆人如此忙于写字，以致没有时间做家务。学校都满了；孩子们只好被关在校门之外。新的学校开设了。罗顿街的循道公会教徒开办了一所学校，由一个获释奴隶做校长。年迈的明戈·乔丹在马隆教堂中教书。在1840年时，有八千名以上的儿童在学，约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时在英国也只有五分之三的人口会读书写字）。

教徒们都乐于为造房子或教会的开支捐钱。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英国行教会每年约收到七十英镑，有些是个人捐的，有些是获释奴隶的各个种族集团捐的。本地筹得的进款，其中包括结婚费和洗礼费等，就用之于殖民地，主要是用在造房子上，而不把款项解往伦敦。

英国行教会在这个除了新来的获释奴隶以外 214  
差不多已可称之为殖民地的基督教人口中重新站定脚跟之后，它重又燃起了使邻近的各族人民也